

契丹、女真、西夏文中数目的文字表示

唐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渊源自汉字的三种中古文字——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中数字的单字构成和文字表现反映出文字体系中词符和音符之间更多是交织作用而非必然过渡的关系, 而词符向音符转化过程的不彻底性又主要受制于文字符号需要表达的内容和文字本身记录的语言的类型特征这两个方面。

关键词: 契丹大字; 契丹小字; 女真文; 西夏文; 数字

中图分类号: H022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语言中的数量表示, 往往依赖于有限个单体的数词即可表达出实际需要的无限个计量语汇; 对应于形诸书面记录的文字而言, 单体的简单数字都是一个元素极为有限的封闭集合, 再以此为基础通过简单数字的复合来完成各种计量结果的登录和记载。由于数字在一种文字文献中出现的高频性, 因而, 考察某一文种的数字就不失为研究相应类型文字性质的一个有效手段。

由汉字在中古时代衍生出来的三种官方文字——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 在相应的王朝覆灭之后就逐渐湮没废弃, 但流传至今尚有数量不等的文献颇值研究, 从而也就要求这三种死文字的破译需要率先取得系统性的突破。目前的研究形势大略是: 有对译字书存世的女真文和西夏文解读的进展较大, 缺乏任何写本材料出土的契丹文字进展维艰(聂鸿音 1998: 72—81)。大概是由于上述文字的非自源性质使然, 对它们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文献学的对勘和历时语言学的构拟方面。本文则另辟蹊径, 试图从这三种具有共同渊源关系的文字中某一类固定语义的单字入手, 以便由点及面, 着重挖掘其间可能揭示、但却一向少有关关注的文字学本身特性。

人类需要表达的计量结果无数, 而语言中可以承受的数词则是有限的, 无限的计量结果是在有限的数词基础上利用运算原则和位置原则复合而成的([苏]伊斯特林 1987: 520—521)。就记录语言的文字而言, 对数字的研究首先是考虑由一个不可拆分的字符表示的简单数字这一情形; 然后才是基于此的复合数字。若以文字学的眼光来审视数字, 则只需考察作为单个字符的简单数字, 本文的分析即着眼于此。

(二) 数字的特征表现

契丹人留下了两种文字: 契丹大字(macroscript)和契丹小字(microscript)。两种文字在形制上都是仿造汉字而创制, 其间的区别在于契丹大字总体上直接因袭汉字的几乎所有文字特征, 是一种典型的意音文字(logosyllabography); 而契丹小字则在创制过程中借鉴、吸收了辅音型的拼音文字(abjad)回鹘文文字特点的精髓, 成为一种基于原字(archiscript)拼合而成的音节/音素型(neosyllabic)方块拼音文字(聂鸿音 1998: 194; Lyovin 1997: 35—36)。迄今这两种文字仍未获得实质性的全面破译, 但在数字方面却已有颇为充分的解读。

在契丹大字中, 目前已经释读的简单数字包括——

个位数字： 一 二 三 卅 / 卅 五 本 / 末 非 艾 / 屎 交 / 交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位数字： 十 廿 卅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十 九十 百 千 万
 十 廿 卅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十 九十 百 千 万

再由上述简单数字组合成各种合成数字，目前所见的文献中虽未发现完全，但足以证明其合成规律一如汉字中数字的构成情形，例如：

十二 “十二” 十本 “十六” 廿卅 “廿四” 廿五 “廿五” 二百 “二百”

上述字符都是典型的词符（logogram）。此外在《北大王墓志》第6列还发现有^流十来表示“六十”（刘凤翥 1998：322），从字形及字源上看显然为音译词；只是由于同此语词相关的上下文尚未完全解读，所以现在还不能明确这一语词究竟是仅仅音译汉语词还是在此基础上也具有计数功能。

但契丹大字有时可以作为音符（phonogram）使用，比如百五一般用来对译汉语词“招讨”（刘凤翥 2002：211—212）；单独的^五也用作表音字（刘凤翥、唐彩兰 2003：84；契丹文字研究小组 1970s：101）——比如：

1) 奎汎廿五岁癸十月廿二日 “重熙二十兔年十月二十二日”《故太师铭石记》第39列

其中的^五对应汉文史籍中留存的契丹语词“兔”之读音“淘里 / 陶里”（于宝林 1998：317），这时的契丹字则并非数字。这种情形应当与表意的数字区别开来。

契丹大字中的序数词目前在石刻文献中发现了表示“第一”的^夷和表示“第二”的^{昊予}，用在亲属排行中对应汉语的“孟”和“仲”（刘凤翥、唐彩兰 2003：77），用例如：

2) 兄弟^夷父^夷 “兄弟之孟父房”《萧孝忠墓志》第2列

3) 早^予由^夷国^夷兄弟^{昊予}父^夷 “大中央哈喇契丹国兄弟之仲父房”《耶律习涅墓志铭》第1列

4) 尤^夷杏^夷公主^夷二^夷昊^予子^夷 “□□国长公主二人之仲子”《永宁郡公主墓志》第7列

还有见诸《永宁郡公主墓志》第5行的^夷尤^夷今可从上下文推断为序数词，但尚不知其确凿含义（刘凤翥、唐彩兰 2003：82）。这种多个字符记录的语汇同样也暗示了契丹大字内部音符的萌生。

而以契丹小字记载下来的数字，较之契丹大字的反映则更显丰富、完整，包括——

个位数字： 毛 圣 包 宅 戈 灰 屏 至 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位数字： 毛 / 宅 丁 一 了 乙 义 门

十 廿 卅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千百位数字： 耶 矢 / 达 疾 / 丹

百 千 万

由以上各简单数字即可构成合成数字，原理同契丹大字。它们也是典型的词符——这种情形实际上有悖于契丹小字整体的音符拼缀格局。

已经发现并获确认的契丹小字序数数字有以下一些：

穴 / 𡩊 𡩊 𡩊 𡩊 𡩊 𡩊 𡩊 𡩊 𡩊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其中的多数语词末尾皆有𡩊一字，且此字和基数数字𡩊、𡩊分别构成相应的序数数字，表明此字当为序数词的标记（之一）；而也屡见于上述序数词中的𡩊 / 𡩊两字（是否为异体也无定论），或为词根与词缀之间的连接音素，或为序数词词缀的一部分，迄今尚无明确结论。这些序数词的书写形式有直接借助基数词词根构成的，也有完全采用不同的原字来拼写的，序数词的书面形式本身还有不同的原字异写表现，这既是契丹小字拼音化的具体体现，也说明这种官方颁行的文字实际上还缺乏明确的规范化。

由于已出土的契丹文材料几乎全为墓志，因而年龄或寿命的计算在契丹字数字的运用方面表现十分显著，其表达上的特点是常常不出现“年岁”字样而直接以数字加缀格助词，或是“年岁”字样出现在数字之前，契丹大小字皆然。例如：

5) 𡩊𡩊𡩊𡩊𡩊 “十五封团练”《萧仲恭墓志》第 18 列——契丹小字例

6) 𡩊𡩊𡩊𡩊𡩊𡩊𡩊𡩊𡩊𡩊 “于重熙四年六月六十三岁时”《北大王墓志》第 15 列——契丹大字例

这种数词置于名词之后作修饰语的情形在契丹字文献中甚为多见，通常的情形还有：

7) 𡩊𡩊𡩊𡩊𡩊𡩊 “驸马公主二人之州”《萧仲恭墓志》第 17 列——契丹小字例

数词带与位格 (dative-locative) 标记时多用于表示日期和年龄，反映在文字上就是数字同𡩊（契丹大字）或𡩊（契丹小字）的结合使用——后者通常还是与最后一个数字合写。多数文种中数字与格助词连用时都呈线性陈列结构，唯契丹小字中为方形拼合结构，例如：

8) 𡩊𡩊𡩊𡩊𡩊𡩊𡩊𡩊𡩊𡩊 “太师乍里夫人二人之女三十九岁时歿”《耶律习涅墓志铭》第 21 列——契丹大字例

9) 𡩊𡩊𡩊𡩊𡩊𡩊 “大安十年？三十五岁时”《故耶律氏铭石》第 9 列——契丹小字例

类似的结构又见同一石刻第 13 列（清格尔泰、刘凤翥等 1985：587，588）。令人奇怪的是，在本来应该线性分写的契丹大字材料中格助词同其紧前一字却偶有上下合写的情形（不限于数字），如《萧孝忠墓志》第 5、第 6 列中的𡩊𡩊和第 7、第 10 列中的𡩊𡩊，以及《萧袍鲁墓志铭》第 9 行之𡩊𡩊（刘凤翥 1998：325，327）。

根据史书记载，女真人曾经在契丹字和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两种文字，但留存至今的文字材料尚无法反映这两种文字的截然区别，本文亦不拟在这方面多作探究，故而径用“女真字”一词一言以蔽之。传世的女真字资料中以编纂于明永乐（1403—1425）年间的《女真译语》对数字的反映最为充分，包括了——

个位数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10—20 数字：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位数字： 十 廿 卅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 廿 卅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其中部分单体数字显然同基数数字有着渊源关系。而适应面更广的合成形式则是在基数数字之后加缀𐰚“第”字即成（Софронов 1968: 237），略举数例：𐰚𐰚“第一”、𐰚𐰚“第五”、𐰚𐰚𐰚“第二十三”。

至于西夏文数字的使用，几乎完全如汉字中的数字（西田龍雄 1966: 272—273），此处不赘。

上述三种中古时代的方块文字都缺乏表示“零”这一概念的符号；表示日期的次序一仍汉字的“年—月—日”，唯因相应的语言均为 PS—SOV（使用后置词的主宾动）型，因而介词都用在表示“日子”的文字之后。此外，表示同一数量的数字其异体字的存在情况都是比较常见的，只是契丹字和女真字的数字异体大多是各自的不同写法而已，而西夏文中数字的所谓“异体”或许更多是语义和语用上的考虑。

（三）数字字源初探

这三种方块文字渊源于汉字自是毋庸置疑，但在具体细节处理上却呈现各自的特色：契丹大字十最早脱胎于汉字的衍生物，其中机械借用汉字的情形也最为普遍，不仅借用笔画和构件，而且频繁借用汉字整字或将整字略作笔画上的增减；契丹小字借用汉字整字的情形已经非常罕见了，主要是采用汉字的某些构件直接成字以适应其固有的拼音性质；女真字的构成则基于上述两种文字的造字原理，但更多显示出靠近汉字俗体字的简化特征来；西夏字以汉字为参照系的造字过程走了一条迥乎不同的道路，仅仅利用了汉字的构造框架和基本笔画，完全摒弃了对汉字构件或整字字形的直接借用。下面就其中数字的构造，按造字时的源字借用类型分别阐述其间细节；唯因数字字源的研究迄今尚无完全、透彻的公认成果，这里所举诸例则只涉及已获揭示的字源。

一）直接假借字源，不作任何字形上的更动。这种情形多见于衍生较早的契丹大字，如契丹大字一“一”、二“二”、三“三”、五“五”、十“十”、百“百”、千“千”；女真字百“百”稍有变形——亦可参考《北大王墓志》第1列中的契丹大字形式𐰚（金启琮 1984: 22；契丹文字研究小组 1970s: 61）。这种跨语言的文字借用虽然并非“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汉字传统“六书”之假借（实属“音借”），但却是字义取代字音成为两种语言使用同一字符承载不同音值的基础性表现，属于所谓的“义借”，当为假借内涵的合理拓展（聂鸿音 1998: 106—107）。

二）改变源字位置和方向但不改变其笔画或构件。比如，倒书源字的情形有女真字𐰚“六”（金启琮 1984: 277）。

三）字形笔画略作增删，而总体框架并无变更。细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增加笔画的情形，有女真字𐰚“三”、𐰚“八”——比较汉字“八”而笔画有所变形（金启琮 1984: 20）、𐰚“十”、𐰚“千”为汉字“千”的增笔（金光平 1980: 19）、𐰚“万”——比较汉字俗体字“万”；

2）减少笔画的情形，有契丹大字𐰚“六”——比较汉字“來”，女真字𐰚“四”——比较表音的女真字𐰚[da]（金启琮 1984: 58）；

3）改变笔画的情形，则有契丹大字𐰚“萬”——比较汉字俗体字“万”，女真字𐰚“一”、𐰚“二”、𐰚“九”（张公瑾、王锋 2000: 214）、𐰚“七”——可以比较契丹大字《辽太祖陵墓残石》中的𐰚（金启琮 1984: 20）、𐰚“十一”——比较契丹小字𐰚“一”（金光平 1980: 22）或汉字“乇”（黄振华 2000: 196）、𐰚“十三”有异体𐰚见诸陕西西安孝经石台顶部《女真字文书》残叶（乌拉熙春 2001: 205）并比较汉字“口”（黄振华 2000: 197）。

在契丹小字中，出现了在简单数字右上角加点构成新字的情形，已经发现和释读的有：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这或许也是笔画增益造字的一种特殊典型吧。目前对这一情形的解释有基数词和共数词的分别（即实 1988：97—100）、词末不带-n 和带-n 的差别（陈乃雄 1996：600）、非敬体一强调和敬体一强调的区别（陈乃雄 1996：373）等几种论断；但这种加点构成新字的方式并不仅仅限于数字之内，其它小字中也有反映：和——其语义相通但出现的情形不同（刘凤翥 1986：319—320），具体的区别目前尚未有颇具说服力的明确解释。基于此，我们在考虑这种加点造字的具体用意时不应当囿于数字的局限。鉴于这种带点数字在业已发现的文献中只以单体形式出现且出现频率极低（陈乃雄 1996：366），而通过留存于汉文史籍中汉字音译的契丹语人名可以看出，契丹语的体词似乎应该存在着两个互补的附加成分：黏着于元音 a-/e-/i-/o-之后的-n 和黏着于元音 u-或辅音之后的-in（聂鸿音 2001：59），这种词干末尾鼻音-n 的隐现正对应蒙古语中可变词干以及简化领属格（清格尔泰 1992：150）的情形。具体而微的有关探究，则需要对契丹语的系统构拟作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基础。

四）保留源字轮廓，但构件大多完全不同。该情形尤见于只采用汉字构形原则而不借用具体汉字偏旁的西夏字，例如西夏字“七”来自汉字“貨”、“八”来自汉字“貝”（黄振华 2000：205）；女真字也有“五”参见其最早的异体并比较汉字“五”（金启琮 1984：271）、“三十”之来源于汉字“卅”（金启琮 1984：242）、“九十”来源于汉字“九”的变笔（金启琮 1984：83）。

以上三种类型的实质可以视为单字所代表的语词在义类一致基础上通过具体用笔方式上的变化来分化出不同文种中的单个字符，似乎契合“六书”理论中对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大多数不能纳入“六书”的字符其来源都能获得较为完满的解释（聂鸿音 1998：108—110）。可见，这一跨文种的分析是否切合许慎原意并无确凿的反证，但却或许有助于完善看似早已过时的传统字源解释。

五）多字拼合成为一个新字，其间多是同一文种中单字的拼合，也有不同文种中单字拼合的情形，显然可以汉字“六书”理论的会意来概括。这类合体符号（ligature）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直接拼合的情形如女真字“十五”（金启琮 1984：27）、“四十”之《女真文字书》所见异体来自女真字“廿”之与汉字“十”叠加而成（金启琮 1984：23）；

2）拼合后有笔画减损的情形如女真字“十九”为汉字“十”“九”相叠简化而成（金启琮 1984：18）；

3）拼合后有笔画变形的情形如女真字“十六”之于汉字“六”“立”（金启琮 1984：144）、“十七”来源于汉字“十”“七”二字直行连写变笔（金启琮 1984：83）、“十八”为汉字“十”“八”相叠变笔而成（金启琮 1984：200）、“廿”为汉字“二”“十”之直行叠加变形（金启琮 1984：144）、“七十”为汉字“七”“十”二字相叠的变笔（金启琮 1984：200）。

对于西夏字而言，西夏人自己所编的字书《文海》有残本存世，但其中对各个单字构造的剖析，即使是考虑数字也似乎显得仅仅是对一种带有所谓“分析构成字的求语”——即指示字（史金波 1983：3）的四字结构的机械袭用，比如：的结构是“一之左减”（史金波、白滨、黄振华 1983：232，473）、的结构是“七之头减”（史金波、白滨、黄振华 1983：297，520），而的结构是“第四下勒右”（史金波、白滨、黄振华 1983：310，529），等等，其间反映的看来多是西夏字之间表面上的某些关系，其实并未揭示被解释单字的字源，遑论西夏字同汉字的关系了。因此，西夏字的字源恐怕还不能从西夏人自己的分析中求得。

上述字面的特征反映出, 仅仅借用汉字笔画并参照汉字造字理论而另行成就字素以造字的汉字笔画字——西夏字显得颇具理据性, 而以汉字为基字直接进行笔画增损或变异而形成的汉字变形字——契丹字和女真字缺乏内在理据(王锋 2003: 150—151)。但由于字源研究远未深入, 而造字理论又必须以合理的字源追溯为立足点才得以正确的系统发展起来。目前关于上述三种文字的资料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够正确剖析契丹—女真—西夏这一系列文字的内在结构, 因而, 即便是在仅限于数字这样一个数量极为有限的文字集合内, 也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探究。

(四) 数字的特征映射

数字都是表意性质的词符文字(logography), 这种情形不惟见于意音文字体系。拼音文字(syllabography)中也多采用表意性质的符号充任数字, 如现代文字中习用的阿拉伯数字和西欧文字中常见的罗马数字皆是; 古典类型的拼音文字中, 希伯来文字和古希腊文将各字母硬性赋予一定的数值用作数字亦属于这一词符类型([苏]伊斯特林 1987: 527—533)。只有回鹘文、满文等少数古典民族文字中才缺乏专门的数字词符, 而在各种书面文献中都是直接拼写出相应语言中的数词来。

作为黏着语的契丹语和女真语, 无论是对应用于语言载体的意音型大字还是音节/音素型小字, 数字都是表意的词符文字。譬如契丹小字已广泛采用了或表音节或表音素的原字来拼缀语词, 但仍有不少体词词根为词符性质的多音节单字, 这里面就包括所有的基数词——而与其对应的序数词既有以多个原字拼缀的纯音读形式, 也有在基数词符基础上接缀音读词缀构成的音义混合体, 这就表明契丹小字中数字本身固有的计数功能对文字表意特征的密切倚赖。同时, 前文已述及, 契丹大字中的表意词符兼作音符, 且大字中的序数数字却出现了音节化的倾向。而在数字运用的各种具体场合(日期、年龄等的表达), 历来以单体出现的数目末尾一字往往同词缀等音符构成合体符号, 仍然反映出契丹文字中词符同音符交织作用的态势来。

由此可见, 契丹大字同契丹小字之间其实并无截然的分野: 契丹大字固然是大量采用词符来直接记录语言, 但在与数字纪年和计寿等方面已有多种音节拼写和语词缀合形式; 契丹小字则以原字拼缀语词为最普遍的形式, 然而数字的使用却成为典型的词符表意形式——其间词符和音符的使用似乎只是数量的多寡且呈现递进渐变的态势。那么, 契丹小字仿依回鹘文字原理而得的所谓“数少而该贯”之特点(清格尔泰、刘凤翥等 1985: 4), 似乎可以看作是以词符文字占绝对优势的大字向使用音节/音素型文字来拼写大多数语汇的小字的演化结果。

女真文的创制率以契丹大小字为蓝本, 女真大小字的关系理应反映出契丹大小字之间关系的特征来。前文述及: 女真字即便是在基数词的使用中也表现出由综合程度高的单体词符向分析程度明显的复合词符过渡, 而数字的具体使用中加缀词法性的音符也很明显; 只是在造字上, 女真字采用较多合体符号以适应女真语中更为丰富的简单数词, 似乎反而限制了数字本身纯粹的音节化趋势。这或许正是现存女真字难以区分其间孰为大字、孰为小字的一个原因吧。

契丹字和女真字中数字表现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是简单数字并不局限于习见的一至十和百、千、万情形, 整十位的数量也以简单数字表示, 在女真字的古典时期连十一至十九亦如是观。这种情形自然表明相应语言中的对应数词也并非简单数词的复合; 而从女真文数字中已经出现由简单数字向合成数字的过渡情形, 表明前述习见的计数类型或为语言中数词的普遍发展方向。另外, 如果契丹语同女真语真是归属共同的阿尔泰语系, 那么, 女真语中简单数词较之契丹语中的复杂性似乎又表明女真语保留了来自原始共同语的更多古老特征, 而契丹语虽然见诸史籍时代更早, 却实实在在显出发生学上的更多后起特征来——这一见解同伯希和当年指出(贾敬颜 1982: 99)契丹语是一种腭化音很重的古蒙古语(蒙古语族语言的固有音系中普遍缺乏腭化音)竟然是一致的。

与此相反, 西夏文中数字的简捷, 正如汉字对应汉藏语系语言突出音节的特性一样, 也与藏

缅语族的西夏语本身类似汉语的特点密切相关。西夏文中的数字不论基数序数，多有不只一套符号来表现，其间似乎隐藏着文字外壳下语言内部的分歧——这同阿尔泰语系中即便跨语族数词也多呈现一致性的情形大不相同。然而，西夏文中的数字仍以立足基数词的各种分析表达形式涵盖层面最为广泛，则又是世界语言中数量表达趋于一致的普遍特征的一个具体体现。

以上三种中古时代方块文字中数字特征的多方面比较表明，文字中的词符往往有向音符转化的趋势，这恐怕是语言本身的要求；但是这种转化趋势并非必然也多不彻底，其间的制约因素突出体现在文字符号需要表达的内容和文字本身记录的语言内在的特性——尤其是其类型特征——两个方面。此外，意音文字的符号化、简化和规格化在显著性和渐变性等方面（王元鹿 2001：151）亦缺乏整齐划一的特点。当然，本文论证的依托殆为未获彻底解读的非自源性文字，其结论的有效性或许又有所折扣了。

参考文献

- [1]Lyovin, Anatole V.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M];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Софронов, М. В. 1968: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нига 1*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3]西田龍雄:「西夏語の数詞について—その再構成と比較言語学的考察—」[A];《石濱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学論叢》[C]、関西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室石濱先生古稀記念会、1958（83-131）。
- [4]西田龍雄:西夏語の研究—西夏語の再構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讀— [M]: 卷二; 東京: 座右宝刊行会、1966。
- [5]陈乃雄: 陈乃雄论文集 [C];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6。
- [6]黄振华: “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 [A]; 载赵丽明、黄国营 [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99 汉字应用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00（192-209）。
- [7]即实: “关于契丹数词音读问题” [A]; 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4 期（89-100）。
- [8]贾敬颜: “契丹文” [A]; 载《中国民族古文字》[C], 北京: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1982（85-108）。
- [9]金光平、金启棕: 女真语言文字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10]金光平 [遗稿]: “女真制字方法论——兼与日本山路广明氏商榷” [A], 金启棕 [整理]; 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4 期（11-27）。
- [11]金启棕 [编]: 女真文词典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 [12]李范文 [编著]: 夏汉字典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13]刘凤翥: “契丹小字  和  的解读及其它” [A];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 [编]:《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317-325）。
- [14]刘凤翥: “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 [A]; 载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 7 期（313-337）。
- [15]刘凤翥: “最近 20 年来的契丹文字研究概况” [A]; 载《燕京学报》新十一期 2001（205-246）。
- [16]刘凤翥、唐彩兰: “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 [A]; 载《燕京学报》新十四期 2003（71-93）。
- [17]聂鸿音: 中国文字概略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8。

- [18] 聂鸿音: “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 和*-in” [A]; 载《民族语文》2001 年第 2 期 (56-60)。
- [19]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 [编]: 契丹大字资料汇辑 [M];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内部刊行, 1970s。
- [20]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 契丹小字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21] 清格尔泰: 蒙古语语法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 [22] 史金波: “从《文海》看西夏文字构造的特点” [A]; 载史金波、白滨、黄振华: 文海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1-30)。
- [23]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 文海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24] 王锋: 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 [25] 王元鹿: 比较文字学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1。
- [26] 乌拉熙春: “《女真文字书》的复原” [A]; 载《碑林集刊》第 7 辑 [C],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 (186-206)。
- [27] [苏]伊斯特林, B. A.: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M], 左少兴 [译], 王荣宅 [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28] 于宝林: 契丹古代史论稿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8。
- [29] 张公瑾、王锋: “汉字型民族文字的造字方法” [A]; 载赵丽明、黄国营 [编]: 《汉字的应用与传播——'99 汉字应用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00 (210-219)。

Approaches to the Numeral Characters in Khitan, Jurchen, and Tangut Scripts

TANG J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Khitan scripts, Jurchen script, and Tangut script, derived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come up with the numeral signs typical of some grammatical features in their characteristic constructions and graphic expressions that there is an interwoven connection, instead of an eventual substitution, between the logograms and the phonograms. And the frequent imperfectness of the logo-phonographic evolution results mainly in the contents suitable for the created writings and in the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evant languages as well.

Key Words: Khitan macroscript, Khitan microscript, Jurchen script, Tangut script, numeral sign

收稿日期: 2004-9-12

作者简介: 唐均, 男,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